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李广田

LI GUANG TIAN

代表作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李广田代表作

云无心 编

黄河文艺出版社

凡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编 李何林

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家鸣 李何林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羨璧

前　　言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飞跃发展，文学艺术领域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文艺的春天来到了，文坛新人新作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文坛老将也焕发出不减当年的青春活力。最近召开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希望作家们大胆解放思想，更加热情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可以预料，在我国的文艺领域内，将会出现更加繁荣的景象。

在新的历史时期，祖国和人民仍然怀念着在现代文学史上作过贡献的已故老作家、老艺术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曾经长期被禁止的许多作家的作品，重新出版，使当代文坛更加多姿多彩。李广田同志离开人世已经十七年了。近年来，北京、天津、广州、云南、宁夏、香港等地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各种作品，他的文集将陆续出版。而且研究他的作品、生平的人也多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南开大学《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邀我为这套丛书再编一本李广田作品的选集，并说明这是一套大型丛书中的一本，不可缺。我一方面感到盛情难却，另一方面也有些为难，为难的原因倒不是不可以从李广田大量的遗著中选出二十多万字，而是怎样才能编出一本和已经出版的几种选集有区别的新选本，不致与以前的选集重复。经过反复考虑和挑选，这本选集决定突出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收入《欢喜团》中的四篇短篇小说。关于《欢喜团》这本短篇小说集，从《金坛子》的后记中可约略知道它的命运。后记说：“抗战期间，曾在桂林的工作社印过一个短篇小说集，书名《欢喜团》。这本书出版不久，桂林即沦入敌手，因之除已经发出的若干册外，其余大部分都毁于炮火。”现在国内仅桂林图书馆馆藏一册，土纸印刷，水渍虫噬，很多字迹都模糊不清了。近年来出版的李广田各种作品选集均未选《欢喜团》中的篇什。现经多次校勘，决定收入其中的四篇小说。

第二，《向往的心》是一部手抄本诗稿，为李广田青年时代所作，于一九八二年在家乡发现，其中有六首曾发表在一九三〇年的《华北日报》副刊上，大多数至今未发表过。现从中选辑十一首，以补其它选本之不足。这些诗作，在“左”的思潮泛滥的年代，是绝不可能公诸于世的，因它不符合“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要求。现在情况不同了，创作有了自由，诗终归是诗，而不是政治概念的传声筒，即使传的是革命的政治概念，也不能丧失诗的特质。当然，这些诗稿属于李广田的“少作”，但从中确可以听到一个青年诗人真挚的声音，发表它，也有助于对艺术上还比较稚嫩的李广田创作的研究。

第三，李广田在新文学史上是以散文著称的。冯至先生称“广田的散文在乡土文学中是独树一枝的”（《李广田文集·序》），所以各家选本都比较注重选辑他的散文。但考虑到近年来已出版过他的散文集的单行本，为避免重复太多，这本选集选取散文时采取了少而精的原则。

李广田，山东省邹平县人。一九〇六年出生于一户王姓农民家里，排行第四，取名锡爵。由于家境贫寒，在他出生后不久，便被“借”给中年无子的舅父，改姓李，名广田。不论是亲父还是养父，都是勤苦的农民，终年忙碌，极少闲暇。母亲不识字，除操持家务，农忙时也到田间工作。

邹平，原名齐东，离省会济南百余里。树木、村落，村落、树木，祖先永息的累累荒塚，一片寂寞而无边的平原。他在《山水》一文中曾以一个平原之子的心情赞美过平原上的秋风禾黍，大车工东，讴歌过祖先世世代改造平原的劳动。这块平原介于黄河和小清河之间。黄河之水天上来，流经他的故乡而泻入东海。他从小看惯了汤汤黄河水，听惯了滔滔黄水声。他把黄河比作一架长琴，“我看见那条琴弦在月光中发着银光，我可以看到它的两端，却又觉得那琴弦长到无限。”（《回声》）在这长琴的演奏中，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他在家里曾跟祖父读过《百家姓》，在私塾中读过《三字经》和《弟子规》，挨过打，逃过学，虽然这一段受教育的时期非常短，但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却留下不少伤痛。废除私塾后，乡村成立初级小学。父母亲不赞成自己的儿子作读书人，因此在小学中每买一次新书，为了向家里要钱，就得大哭一场。至于买文具，更是不可想象，他心中常含着委屈。只有祖母是疼爱他的，她用破纸糊的风筝、用草叶做的小笛，给他孤苦的童年以抚慰和欢乐，偶尔拾到一只从房檐掉下来的小雀，也当作礼物送给孙儿。然而这一切并不为终日在田间忙碌的父亲所理解，终于将小雀扔

上了房顶。这便是《悲哀的玩具》所描述的那个真实的故事。《悲哀的玩具》虽是作家童年的写照，却寄寓着作家对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的命运和悲惨地位的同情。

一九二一年，李广田进了师范讲习所，不到一年半，便被县立小学聘去作教员。得了报酬，有了路费，他瞒着家人跑到省城考入省立师范。当时正是新文学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文学刊物和文艺社团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李广田贪婪地阅读新文学刊物，从这些精神食粮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他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和朋友们组织书报介绍社，大量介绍文研会、创造社、未名社及苏俄的作品，由京沪各地购入大批新书，卖出之后再续购。由于政治形势恶劣，邮电检查非常严格，他们所购新书中有关《文学与革命》若干册，书未到手，便被山东督办张宗昌的特务查获，李广田被捕入狱，判处死刑。他万没想到会因为一本书而判如此之重的刑罚。在狱月余，受尽酷刑，他的父亲卖掉祖传的林木和桃园，也未能把他赎出，直到济南发生“五卅惨案”，张宗昌逃跑，“地面上的政局起了变化”，他才“于一夜枪声中复得自由”（《银狐集·一个好朋友》）。

出狱后回到家乡，方知由于自己的不幸连累了家庭。在家不能久住，他便先到一个偏僻的小城，后到曲阜二师附小教小学。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师为演出林语堂独幕话剧《子见南子》，遭到孔府封建势力的攻击和控告，全国舆论哗然。为了支持反封建势力的斗争，李广田曾为学生草拟宣言，将此案内幕公诸于世，这对揭露“圣裔”的淫威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

一九二九年夏，李广田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来到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北平。当时的北大文学院设在东城沙滩的红楼，这里是许多历史风暴的发源地。红墙绿瓦的文化故都深深吸引着这个从乡间出来的有志青年。

他在《未名》半月刊的终刊号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狱前》。文章以一种内心独白的议论手法回顾自己被捕入狱的生活，表达了他——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为真理视死如归的坦荡胸怀。这篇文章发表在《未名》半月刊上，是因为《文学与革命》是未名社出版的书，这本书是造成李广田被捕的缘由。终刊号的“收场白”中有这样一段话：“出到第五期的时候，它的生命竟因《文学与革命》被张宗昌的部下文臣查禁，并由那时的北京当局把我们几个人传去拘留，而夭折了。经过半年的休息，因出版部之创立，它又复活了。然而此后的它乃是负着伤，而又忍受着高压，苟延残喘而已。”可见，济南的逮捕案对未名社的活动及刊物的存在都有过不小的影响。

李广田很少与人往来，埋头苦读英、日、法文，在诗人戴望舒主编的《现代》杂志和杨晦主编的《华北日报》副刊上开始发表诗作。同时发表诗的，有当时外文系同学卞之琳和哲学系同学何其芳。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这三个先后迈进汉花园的青年，时时都在关心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他们把对人生真谛的探索表述在自己的诗里，心心相印，步步耕耘，并互相倾吐自己的思想。何其芳在《还乡杂记·序》里说：“就在这时候我开始和两位同学常常往还……在那两位同学中，一个正在字斟句酌地翻译着一

些西欧作家的散文和小说，另一位同学也很勤勉，我去找他，他的案上往往放着尚未读完的书，或者铺着尚未落笔的稿纸……于是我开始了不分行的抒写。”这两位同学指的就是卞之琳和李广田。卞之琳在《李广田散文选·序》（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中说：“当时，每天清晨，我注意到在我们前边的有小树夹道的狭长庭院里，常有一位红脸的穿大褂的同学，一边消消停停的踱步，一边念念有词地读英文或日文书。经人指出，我才知道这就是李广田。同时，在‘红楼’前面当时叫汉花园的那段马路南边，常有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一边走一边抬头看云，旁若无人的白脸矮个儿同学，后来认识，原来这就是何其芳。……其芳先在大学办过一个同人小刊物叫《红砂砾》（格式仿《语丝》和《骆驼草》），广田较后办过一个同人小刊物叫《牧野》（字已横排了）。两个小刊物的名字叫人看得出各有家乡风味。我把两位主编先生拉到一起了以后，我们三个人当中，在为人处世方面，还是广田不愧为老大哥。”

后来，卞之琳把他们三人的诗合编为一集，题名《汉园集》，一九三四年交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出版。他在《题记》中写道：

“这是广田、其芳和我自己四、五年来所作诗的结集。我们并不以为这些小玩意儿自成一派，只是平时接触的机会较多，所写的东西彼此感觉亲切，为自己和朋友们看起来方便起见，所以搁在一起了。我们一块读书的地方叫‘汉花园’。记得自己在南方的时候，在这个名字上着实做过一些梦，哪知道日后来此一访，有名无园，独上高楼，不胜惆怅。可是我们始终对于这个名字有好感，又觉得书名字取得老气横秋一点倒也好玩，于是乎《汉园集》。”

《汉园集》中的《地之子》一诗是李广田早期诗歌的代表

作，它和手抄本诗集《向往的心》中的《父母与沙原》可以看作姊妹篇。它们凝聚了诗人对大地母亲的人子的深情，其质朴无华的风格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贯穿了李广田一生的文学活动。

从此，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以诗会友，终生保持着不渝的友情，被现代文学史家称为“汉园三诗人”。

在写诗的同时，李广田开始写散文。他醉心于他的老师周作人一派提倡的散文小品和英国、阿根廷作家怀特、哈特生、玛尔廷的乡土文学。他们的作品都象大自然的抒情诗，表现大自然的沉思、静美，歌颂淳朴的人生。李广田在《道旁的智慧》中写道：“在玛尔廷的书里找不出什么热闹来，也没有什么奇迹，叫做‘道旁的智慧’者，只是些平常人的平常事物，似乎是从尘埃的道上，随手掇拾了来，也许是一朵野花，也许是一支草叶，也许只是从漂泊者的行囊上落下来的一粒细砂。然而我爱这些。”这些文章“都是自然而洒落的，每令人感到他不是在写文章，而是在一座破旧的老屋里，在幽暗的灯光下，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在低声地向我们诉说前梦，把人们引到了一种和平的空气里，使人深思，忘记了生活的疲倦，和人间的争执，更使人在平庸的事物里，找出美与真实。”（《画廊集·题记》）玛尔廷的艺术理论，就是要探寻原始的真的诗之诞生。李广田受了这种理论的影响，也坚信：真的诗歌，如同真的美，纵然它赤着脚走在道旁的尘埃里，也不会被埋没。

大学时代，李广田写了不少散文，多是故乡童年的回忆，后来结集成《画廊集》出版。这些文字，都象他追求的怀特、玛尔廷的散文一样，从他的故乡这一特定“画廊”里“一些平常而又杂乱的年画”中，向人们诉说着一个太狭太小而又太缺少华丽的世界，一个朴野的小天地里的童年的梦幻。玛尔廷在散文中写伐木

者、取水者，甚至写有心肠的乞丐，想通过这些平庸的人道出生的真理——这些真理是送不进皇宫的，如同道旁的尘埃，却能为倦旅者顺手摘取。李广田总是在早期的作品里拾取过往的时光，把自己“这个极村俗的画廊的一切有机会展览起来”（《画廊集·题记》），贮藏在记忆中，然后再开始长途的跋涉，就好象骆驼贮藏了水，是为了长远的沙漠之行。

三

一九三五年从大学毕业后，直到抗战爆发前，李广田生活在济南、泰安两地，一面教书，一面写作。《银狐集》、《雀麦记》中的许多散文就是这个时期完成的。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从自己故乡那个朴野的小天地，来到名山岱宗，作家生命的一部分曾熔铸在泰山的生活里。泰山以它天赋的灵秀哺育了作家的情思，他对泰山的峰峦流水、苍松翠柏、一木一石都有着母子般的深情。

泰山的西路比较幽静，进山的路大多是香客和牧人践踏出来的，没有石条铺的盘路，只有羊肠小道。攀登扇子崖就是从这里上去的。忽而是乱石如箭的高崖，忽而是平滑如砥的深渊；既有男灌园、女绩麻的山村人家，也会遇上拄着木杖、背着筐篮的进香人。香客们有说不完的神秘故事，给泰山增添了无限的神秘色彩。

《扇子崖》写尽了扇子崖的独立无倚、秀卓傲岸，写出了众山在它面前“却扇一顾倾城无色”的独特风姿。如果说，《扇子崖》写了泰山的雄浑壮丽，那么，《山之子》则塑造了一个泰山的灵魂。泰山后面有个古洞，两面峭壁，中间深谷，峭壁上长满百合花，哑巴的父亲最先发现这个山

涧，冒着风险在陡崖上采摘百合，卖给进山的香客，不幸在一个浓雾天坠入了百合涧。哑巴的哥哥继承父业，不幸也为一阵山风吹下悬崖。我们的山之子不得不拾起这以生命为孤注的生涯，用以奉养他的老母、寡嫂、他的老婆和孩子。不会说话的山之子，用自己的沉默背负着一山的沉默，他用沉默宣说着泰山的伟大。

从《地之子》到《山之子》，不仅是自然视野的扩大，而且是思想触角的深入。他从自己的故土出发，在北平完成了高等教育，又回到故乡。这一段生活使作家看到，现实不光是怀特、玛尔廷笔下的诗样的静美，更多的是充满了苦难。在对现实有了更深的思考和反馈之后，他写出了《井》、《马蹄》、《树》、《荷叶伞》、《绿》等一束哲理性的散文，比《画廊集》有了较大的思想深度，涉及的生活面也较前宽广多了。

四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广田和他的学生们不愿做敌人铁蹄下的亡国奴，在济南沦陷前夕，他们随学校迁往泰山脚下。一九三七年底，他们在敌机狂炸下离开泰安，辗转南下，由河南入湖北，最后到达四川。战争，把他们抛向流亡的旅途。

两年的流亡生活，八千里路云和月。穷山荒水，饥饿寒冷，盗匪疾病——这就是他们流亡途中的路程标。“贫穷，贫穷，也许贫穷二字可以代表一切吧，而毒害、匪患以及政治、教育、一般文化之不合理现象，每走一步都有令人踏入‘圈外’之感。”这段生活的记行文字结集初版时叫《圈外》，再版时改名《西行记》。

现实给予他些什么呢？他看到，一方面是生活在荒山僻野中的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住的是绳枢瓮牖，即便是城镇上，也是妇孺丐者遍街巷，秋雨过后，无可觅食，倒毙者更多，处处可见弃婴或为野狗所食之遗骸……另一方面，是土匪、兵燹、贪官污吏、苛捐杂税、抓丁抽粮，数不尽的罪恶，看不尽的黑暗。

他看到，一方面是一群天真纯洁进步向上的青年，远离在敌人铁蹄下被蹂躏的父老，流亡南下，起初是怀着希望的，结果呢，贪污、欺骗、人事磨擦、封建集团的倾轧，苦得一群孩子不袜不履，甚或连买草鞋的钱也没有，更谈不到求学。另一方面，则是教育界、文化界的黑暗、腐败。由于教育界当事者的昏庸、顽固、视人命如草芥的做法，致使流亡学生中的二十二名少女葬身汉江。这件事给予李广田痛苦的印象，日记中多次提到。学校雇船四只，时值大雨，河水猛涨丈余，硬要前行已很危险，校方又令船载面粉数百袋，加重两万余斤，结果下泻数里而遇礁，船底渗漏，历一小时沉没，听见学生呼救，校方只救面粉而不救人。学生们不是死在抗敌的战场上，而是死于教育界当事者的昏庸残暴。《祭奠二十二个少女》一诗便是记述此事的一首挽歌。此外，他还写了些沿途亲眼看到、听到的人和事，如《江边夜话》、《忧愁妇人》等。《来呀，大家一齐拉！》真实地记述了他们在汉江滩头帮助船夫拉缆的情景。那两只大船象征着我们多难的民族，山高、路窄、逆水、重荷……但是“来呀，大家一齐拉！”一寸、二寸，¹³大船越过险滩，毫无阻挡地前行了，这是“民族的起舞与高歌”，我们民族的大船一定能取得抗战的胜利。

祖国大好的河山洒满了民族的鲜血，蒙受着难忍的屈辱，政治腐败，人民痛苦，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然而地火

渐渐燃成燎原大火。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一些地下党员的接触往来，使李广田的思想有了很大提高和进步。他在战争的年代，在流亡生涯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的先锋，是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力量。教书之余，他读了《什么是列宁主义》、《列宁的故事》、《少年先锋》等书刊，并在学生中传播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为国民党反动派所痛恨。国民党特务到罗江六中四分校“视察”时，责问李广田为什么不按政府编的教科书上课，而讲鲁迅的文章和苏联的小说，之后将他解聘，学校在国民党特务及托派分子破坏下也被迫解散。

李广田称《西行记》中的文字是些苦涩的记载，然而正是这些文字真实地记录了他思想的一个发展，如何从个人生活的画廊转向社会与时代，“渐渐地由主观抒写变为客观描写”（《银狐集·题记》）他看到了黑暗，也写下了黑暗，这是为了“努力从黑暗中寻取那一线光明”（《西行记·序》）。他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的日记中很兴奋地记录下自己思想的这一变迁：“我现在似在向另一方向转移。我是正要在另一方面充实自己，而这一切的认识，进一步努力将给予我将来的文学生活一大助力——我始终对于文学还是忠实的——然而我之所以转移了努力的方向岂不也正证明我的不足吗？……而最重要的还在于生活的力量——世界观与人生观！总之，我现在也许更年青了些，因为我要学习的太多了，我天天忙着，总是有作不完的功课。”

五

一九四一年，李广田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大批民主教授、进步学者荟萃，各种

社团异常活跃。李广田除在中文系任教外，还担任了文艺社导师，和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领导学生的文艺活动。办刊物，出周报，举行各种集会，宣传抗日，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思想的成熟带来了创作的丰收。李广田这一时期出版了散文集《灌木集》、《回声》、《日边随笔》，短篇小说集《欢喜团》、《金坛子》，论文集《诗的艺术》和以自己生活经历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引力》。他这期间写的散文，已趋向杂文笔法。如《空壳》，讽刺了统治者希望人民都成为空壳，成为没有热情、希望、憎恶、愤恨的躯壳，倘有思想，便被指控为神经病患者。《手的用处》也是一篇讽刺杂文：手是用以劳动的，用以创造世界、改造世界的，而有人却用手掩饰丑恶。《到桔子林去》写父女二人到桔子林去的路上所见所闻，通过父女两代人的不同眼光，赞美那些在城外、在林边、在中途、在篝火旁常常遇到的马车夫，他们用自己终年的奔波开辟了一条从内地到边疆的大道，为运送抗战物资尽了不少力。《一个画家》以画家桑子中为原型，歌颂了这个画家勇于“在时代的风雨中去收获他的‘作品’。”

短篇小说集《欢喜团》在国内已经绝版，各大图书馆均无馆藏。《没有太阳的早晨》是《金坛子》中的一篇，它一扫作家早期田园牧歌式的乡土回忆，用鲜明的观点写出了阶级对立的现象。王嫂和千万个王嫂式的劳动者生活在最底层，父子两代的冤仇在那个没有太阳的年月里是无处诉苦的，全书中多篇都是描写悲苦无告的小人物的。

《引力》是李广田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先在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上连载，后由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这部小

说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先是日本的中国研究所出版了冈崎俊夫的节译本，后来，《中国语杂志》又发表了吉田浩的另一节译本。一九五二年，岩波书店出版了冈崎俊夫的全译本，截止一九五九年四月，一连再版十一次。接着，日本学术界和文艺界不断发表评论文章，有的把《引力》中的梦华比诸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瑞宣，有的把它比诸都德的《最后一课》，有的探索了小说在日本拥有众多读者的原因。中岛健藏指出：“冈崎俊夫在一九五二年翻译的李广田的《引力》，使日本读者受到强烈的感动。那是在茅盾的《腐蚀》翻译出版之前，许广平的《夜记》和郭沫若的《亡命十年》等作品尚未翻译的时候，李广田的这部作品，对日本读者起了‘苦口良药’的作用，乃是当然的事了。”（《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世界文学》1959年9月号）现在看来，这部小说至少起了这么一种作用：它所表达的反侵略、反压迫、愿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主题引起了日本读者的共鸣，在中日文化交流的长河中早已把和平、友谊的种子播在了两国人民的心田。

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发动内战。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血的事实使李广田受到强烈的震撼。他在四烈士灵堂（联大图书馆）守灵，每天有成千上万来这里瞻仰烈士遗体的市民。他们扶老携幼，有知识分子，也有农夫村妇，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向死难者表达着崇高的敬意和人间最深厚的同情。在四烈士出殡的日子，李广田参加路祭活动，随同四、五万人的行列走遍全城，一直把烈士遗体送到城外联大新校舍墓地，送他们长眠于三迤的地下。当闻一多先生于暮色苍茫中，站在墓前悲痛地宣誓“我们一定要为死者复仇”时，李广田的悲愤也达到了极点。他写下了杂文《不是为了纪念》和诗《我听见有人控告我》，毅然用真名发表。后来，他在《日边随